发明创造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

■江永红

新书评介

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关于抗战的各类出版物很多。笔者发现，在一些抗战叙事中，作者有时为了突出英勇顽强、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，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物质力量的重要性，对发明创造所起的关键作用也讲述得不够充分。

《抗战烽火中的好发明——战法与武器》（海燕出版社、电子工业出版社）一书，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抗战故事，如地雷战、地道战等，从发明和科技的角度予以重新诠释，赋予了老故事新面貌和新内涵。这种方式力图让读者更全面、更清楚地了解抗日军民留下的光荣传统，对历史研究和未来启示都有一定的意义。

其实，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，充满智慧的发明创造俯拾皆是，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雁翎队，其名字就来自一项特殊的发明。

当年，白洋淀的游击队利用河湖港湾、苇地荷塘，与日军展开水上游击战争。他们使用一种叫做“大抬杆”的土枪，一管能装200多粒铁砂，打出去一大片，百米之内杀伤力很大。然而，这种武器的火门容易受潮，导致哑火现象频发。游击队员们就地取材，用一根雁翎插入火门，有效地解决了受潮问题，雁翎队也因此得名。

又如，铁道游击队之所以练就扒铁轨的绝技，是因为他们独创了扒车钩：一根铁棍，一端设计成钳子，专门用于拧螺丝；另一端则是铲形撬棍头，便于撬动铁轨……这些看似简单却充满智慧的发明，在战争环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充分展现了抗日军民的机智与勇敢。

书中还详细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民兵们，开动脑筋发明的多种地雷，包括踏板雷、吊雷、挑棍雷、夹子雷、钉子雷、梅花雷、子母雷、飞行雷和头发丝雷等。此外，他们还研发了化学引爆地雷和滚珠地雷，并根据实际需求，将其设置为延时或定时引爆状态。

地雷战中的“爆破英雄”赵守福、于化虎、李混子等人制造的地雷多采用石头、瓦罐等简陋材料，外观并不起眼，但在实战中的威力和科技价值不容小觑。

比如，赵守福发明了一种延时起爆地雷，巧妙借鉴了古代滴漏计时的原理，利用竹节、小木板等材料制成计时器，可以精准控制起爆时间，堪称一种土制的定时炸弹。

由于这种地雷具有材料易得、成本低廉、杀伤力强大的特点，各抗日根据地纷纷举办地雷战培训班。仅赵守福一人，就先后指导了不少抗日军民。当时，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，遵照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，组织人员编写了《地雷制造使用法》和《各种地雷触法装置法》，作为地雷战的教材下发至部队，并亲自主持地雷战培训班。

从该书中还可以看出，成熟的地道设计涉及多方面的科技知识。譬如，地道的圆拱形顶体现了工程力学中的拱形原理；挖地道时使用的地面敲击法，实际上运用了声波导航的原理；通信联络中使用的土电话，仅凭一根丝线和两片硬纸做成的话筒，便实现了声波的传递；粪池发酵产生的沼气，被用于照明，堪称一项环保工程。此外，地道的战斗系统、预警系统、防毒系统、防水系统等，虽然设备简陋，但实用性比较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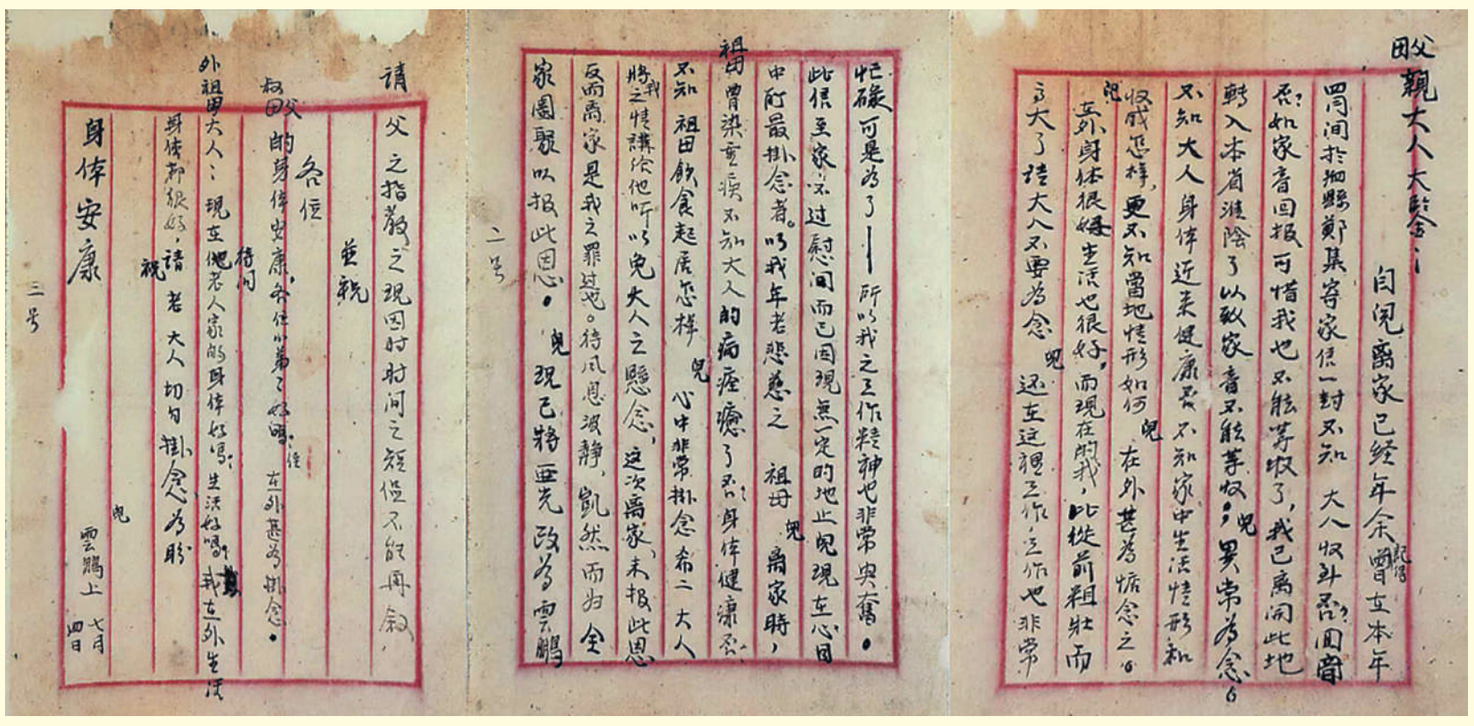
众所周知，广泛流传的《游击队歌》中，有一句歌词是“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”。确实，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以武装自身，是我军武器的一种来源，但若将其当作我军获取武器装备的唯一途径，那就太片面了，不妨加上一句“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我们就自己造”。

抗战时期，面对国民党政府拒绝向我军提供武器弹药的困境，除了在各根据地自行制造石雷等非制式武器外，八路军还专门设立了黄崖洞兵工厂、梁沟兵工厂、韩庄修械所、茅屋兵工厂、琼崖纵队兵工厂等。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洪流中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工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淬炼和锻造。

被誉为“兵工泰斗”的刘鼎，曾在德国和苏联留学，是我军第一批火炮的制造者。他带领一群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，在缺乏机床和原材料供应的困境中，巧妙发明了轨道机床等简易装备，利用拆卸下来的铁轨作为原料，先后成功研制出多种设备。赤胆忠心的军工战士们，夜以继日为人民军队提供军火武器，为战胜凶恶的日本法西斯立下了卓越功勋。

因此，在重温我军抗战历史时，不可忘了咱们的好发明，既包括武器，也包括战法，都是战胜日寇的重要物质力量。并且，重视发明创造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，是抗战精神的组成部分。今年九三阅兵所展示的武器装备，都是从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中精心挑选的。这些装备不仅彰显了我国军事工业的飞速发展，也反映了我军发明创造精神的历史传承与发扬。

视觉阅读



李云鹏平安家信

父母亲大人大鉴：

自儿离家已经年余，记得曾在本年四月间于泗县郑集寄家信一封，不知大人收到否？回音否？如家音回报，可惜我也不能等收了，我已离开此地，转入本省淮阴了；以致家音不能等收；儿异常为念。不知大人身体近来健康否？不知家中生活情形和收成怎样，更不知当地情形如何，儿在外甚为惦念之。

……

待风息波静，凯然而归，全家团聚，以报此恩。儿现已将亚光改为云鹏，请父之指教之。现因时间之短促不能再叙。并祝：各位叔父母的身体安康，各位小弟弟好吗？侄在外甚为挂念。待（代）问外祖母大人：现在他（她）老人家的身体好吗？生活好吗？我在外生活身体都很好。请老大人切勿挂念为盼。

祝身体安康。

儿　云鹏上

七月四日

背景链接

1943年3月18日，为掩护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，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2营第4连82名官兵在江苏淮阴刘老庄，以血肉之躯殊死阻击日伪军1600余人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全部壮烈牺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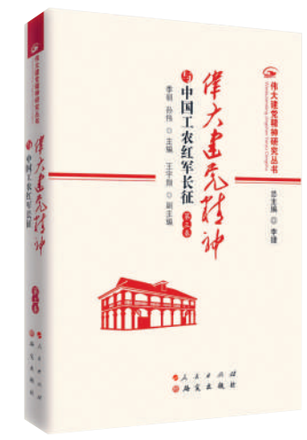
李云鹏就是82烈士中的一员，时任连队政治指导员。这封家信是他于1941年7月4日，在作战间隙写就的。李云鹏的家人收到信后，将书信藏在家中砖墙内保存了下来。后来，这封家信被交给了有关部门，成为珍贵的红色文物。

（图文整理：戴成晨）

创作谈

从伟大建党精神到长征精神

■王宇翔



《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》是人民出版社、研究出版社2025年5月推出的《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丛书》第三卷。该书遵循党史和军史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编排。伟大建党精神是“源”，长征精神是“流”；伟大建党精神是“母体”，长征精神是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“结晶”。我们研究团队通过拜访专家学者、实地参观考察、查阅文献资料等多种途径，吸收长征史研究的最新成果，历经7年艰辛努力，终于完成该书的编纂工作。

全书配有大量珍贵史料图片，紧密围绕“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”这一主题，采取“概述+重大事件”双层结构，以不同视野描绘了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和红军将士不畏艰难、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。该书力求生动再现长征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壮丽画卷，并较为系统地回答了“伟大建党精神”如何在长征途中得到继承、锤炼与升华。

我们研究、回顾、重述长征，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，更是为了从中汲取力量。本书“概述”部分以“伟大建党精神光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”开篇，主要阐述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。当时中国社会危机四伏，日寇野蛮侵略，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，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“围剿”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，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，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。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，红军第一、第二、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。我们党领导红军，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，战胜千难万险，付出巨大牺牲，胜利完成震撼世界、彪炳史册的长征。

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，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。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，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。

在本书“重大事件”部分，我们既保持宏观叙事的视野，也重视微观叙事的细节。“血战湘江”“通道转兵”“遵义会议”“四渡赤水”等长征途中的重要节点，在书中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。特别是“红军过松潘草地”“乌蒙山千里回旋战”“彝海结盟”等故事，能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长征的曲折历程，以及红军将士的崇高精神。

比如，书中描述红军通过长征中的最后一道关口——腊子口。腊子口四周环绕着崇山峻岭，隘口处的河面上横亘着一座木桥，连接两岸陡峭的崖壁，成为穿越腊子口的唯一通道。敌人以逸待劳，凭借有利地形，用机枪严密封锁这座独木桥，红军多次发起进攻，却始终无法逼近桥头。此刻，红军所面临的局势，比背水一战更为严峻。若不能迅速攻克天险腊子口，不仅无法实现北上抗日的主张，红军还将陷入被敌人合围的险境，甚至丧失掉头南下、重返草地的机会。

面对陡峭的山壁，怎么才能上得去？一个绰号“云贵川”的苗族小战士挺身而出，手持带铁钩的长杆，沿峭壁攀爬，率先登上陡峭的山壁。随后，他将用绑腿编织的绳索牢牢系在大树上，垂放下来。后续的战士们顺着绳索攀援而上，迂回至敌人后方，向没有顶盖的敌工事投掷手榴弹。敌人未曾料到红军会从峭壁侧翼包抄，惊慌失措，仓皇逃窜。我军乘胜追击，迅速占领独木桥，连续突破敌军多道防线，一举攻克了腊子口天险。

《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》，从历史与学术角度为读者呈现了一部既熟悉又新鲜的长征史。它揭示了党和红军如何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屈的革命意志，在绝境中重生并最终取得胜利。长征的历史虽已远去，但今天我们回望那段腥风血雨、壮怀激烈的岁月，依然会被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震撼。

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。前进道路上，新的“雪山”和“草地”等待我们去跨越，新的“大渡河”和“腊子口”仍需我们去征服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“长征精神”将一如既往地激励我们勇毅前行。

新书架

本书梳理了日、美、英、俄等国近年解密的二战时期档案文献。书中运用多方史料，呈现外国观察家和情报机构对中共抗战的评价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，书写中共抗战的丰功伟绩和国际影响，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。该书作为党史研究领域一项跨学科、综合性、创新性的研究成果，力求弥补国内外对中共抗战的国际影响研究之不足，对客观全面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具有一定意义。

（雷雪冰整理）

书苑随笔

“居敬持志”读书法

■高怡然

南宋理学家朱熹，被视为“理学集大成者”。他提出的“居敬持志”读书法，贯穿于其毕生的治学与教学实践。该方法强调读书需摒弃浮躁、心无旁骛，在专注中探究义理，在立志中锚定方向，最终实现学问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

这一方法并非空谈，而是源于朱熹从实践中的升华。他在《朱子语类》中提出：“读书之法，莫贵于循序而致精，而致精之本，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。”所谓居敬，并非外在的拘谨姿态，而是内在对知识的庄重与敬畏。面对书本时，心神收敛，不受外界干扰，不被浮躁所裹挟。对于诘奥难懂的章节，更应该以探求真知的态度深入研读。

而“持志”，则是为读书确立不可动摇的方向。朱熹曾用“登山”打比方，登山的人要是不知道山顶在哪，刚开始走得再快，走到一半也会累；只有明确目标，才能一步一步坚定地走，直到山顶。朱熹在与弟子论学时谈道：“立志不定，如何读书？”他主张，要是没有志向的引领，阅读就好比在茫茫大海中漫无目的地寻找，不清楚要去往何方。就算广泛阅读各类书籍，得到的也不过是零碎的知识片段，很难取得真正的收获。

“居敬”与“持志”不是孤立存在的关系，而是相互依存、相辅相成的。读书，缺乏“居敬”的专注精神，即使确立了“明理”的志向，也容易心神涣散，难有所得；没有“持志”的目标，即使能专注一时，也容易半途而废。

这种辩证关系，在朱熹弟子黄榦的治学实践中体现得尤为鲜明。黄榦将“传承师学、完善礼书”作为一生志向，曾自定“每日读一经一子一史”的规矩，公务繁忙也从未中断。有次暴雨冲坏书斋窗户，雨水打湿正在校勘的《中庸》注本，他先将书册移至安全处，坚持完成当日研读任务后，才去修补窗户。

朱熹自身的治学生涯，更是“居敬持志”读书法的生动实践。年幼时钻研《论语》某一章节，他曾连续三四夜伏案至天明。长大后，他随父亲朱松读书。夏日里蚊虫肆虐，同窗多因酷热烦躁不已，唯有朱熹端坐案前，一手握卷，一手轻摇蒲扇，目光始终不离书页。有同学打趣他：“书里有凉风吹吗？”他认真回应：“我在领会书中的要义，这点暑气算什么。”正是这份志定心安，让他对《论语》的理解更为深入。

到了晚年，朱熹隐居武夷精舍，虽双目昏花，但仍未放下对“持志”的坚守。他让弟子读书，自己闭目静听，只要弟子读错一字、理解偏差一分，他便立刻指出：“此处需慢读，义理藏在字句缝里，心不静便听不出来。”临终前半月，他还在修改《大学章句》的注疏，弟子劝他“先生保重身体，此事可待日后”，他却摇头：“我立志注解《四书》，若有一字不妥，便是未竟之志，既对不起圣人本意，也愧对后世读者。”

先贤的读书理念，对今日的学习实践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。广大官兵在阅读时，若心态浮躁、目标模糊，仅满足于“读过看过”，则难以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身素养。反之，若能以“居敬”之心沉潜钻研，以“持志”之念锚定学习方向，做到知行合一、学用贯通，便可将书中道理深植于心，转化为过硬本领，切实提升军事素养与履职能力。

迷彩书屋

长征 第6549期